

近代北京寺庙的类型结构解析

习五一

本文根据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的 1928 年、1936 年和 1947 年三批政府寺庙登记档案，考察近代北京寺庙的总量和儒释道的比重，解析近代北京寺庙的类型结构。在近代京城社会转型中，虽然传统宗教文化总体上呈衰退趋势，但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支柱，儒家宗庙文化具有深厚的生存沃土，汉传佛教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道教信仰依然在民间社会繁衍流传。

关键词：近代 北京寺庙 类型结构

作者习五一，1951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寺庙是宗教社会主要的建筑实体。近代京城承袭千年古都宗教文化的遗产，儒、释、道宫观寺庙众多，为全国都市之冠。各种传统宗教寺庙旗帜林立，成为向社会各界民众传播宗教文化的中心。本文将考订近代京城传统宗教寺庙的实际数量，分析儒、释、道各类宗教寺庙的比重，考察城郊各类寺庙的宗教文化性质，探索近代社会转型与传统宗教的演变趋势。^①

一、近代北京寺庙的总量

中国历史文献大多缺乏精确的统计数字，常常使试图量化分析社会现象的史学家深感头痛。记载近代北京寺庙数量的主要文献有：许道龄编辑的《北平庙宇通检》（以下简称《通检》）和张江裁、许道龄合编的《北平庙宇碑刻目录》（以下简称《碑刻》）。这两部由国立北平研究院 1936 年出版的文献，均未能提供准确的京城庙宇数量。

据《通检》记载，30 年代的京城内外共有庙宇 948 座。其辖区包括内城六区、外城五区和东南西北郊区。这一地理范围大约相当于今日北京的城区和近郊区。编者主要依据历史地理文献，“逐条择要汇抄，然后罗列对比。凡庙名、地址及史略三项均相同者，则合而为一。”^②据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施博尔 (Kristofer M. Schipper) 考订，此书编录的庙宇中，除有四座天主教堂和两座清真寺外，至少有 14 座庙宇重复登录。据《通检》记载，京城传统宗教庙宇约有 900 多座。但这一数字仅根据文献汇编整理，

^① 本文考察的范围为中国传统宗教寺庙，包括儒家宗庙、佛教寺庙和道教宫观等，不包括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以及各派基督教的教堂。

^② 许道龄：《北平庙宇通检》，国立北平研究院 1936 年版，例言一。此书分为上下两编，分别编页。

既缺乏官方档案材料证明，也缺乏学者实地勘察订正。同年出版的《碑刻》成为《通检》统计缺漏的有力证明。《碑刻》的拓片来自京城内外 316 座庙宇。据考证，至少有 70 座庙宇未被《通检》收录。

由于缺乏完备的统计资料，中外学者只能粗略的估计，清末民初北京庙宇约有千座。《通检》分区编录的庙宇，成为学者分析京城传统宗教结构的基本史料。

近年来，随着北京市档案馆逐步扩大开放，一批档案资料陆续整理出版，为统计近代北京寺庙的实际数量，解析其传统宗教的结构，提供了官方档案资料。

笔者曾前往北京市档案馆，详细查阅有关档案史料。民国年间，北京市政当局对传统宗教寺庙进行过三次普查登记，分别在 1928 年、1936 年和 1947 年。从现存的档案考察，二、三十年代资料树干尚存，40 年代的资料仅余枝叶。比较第一、二次的调查登记表，均有若干重要误差与遗漏。可见，当年政府政令的权威有限，调查统计的力量也比较单薄。

1928 年的寺庙登记档案保存比较完整丰富。这是北京建市以后第一次进行寺庙登记。此次政府登记的档案文献，可以作为考订近代北京城郊传统寺庙数量的基础资料。1928 年 10 月，南京国民政府内务部拟订《寺庙登记条例》，经行政院核准颁布执行。北平特别市政府训令社会局遵照实施。自 1928 年 11 月起，至 1929 年 5 月，全市陆续办理寺庙登记。当时，政府发放的登记表格共有四种，分别为“寺庙登记条款总表”、“寺庙不动产登记条款表”、“寺庙人口登记条款表”、“寺庙法物登记条款表”。90 年代，北京市档案馆将这批表格整理，汇编收入《北京寺庙历史资料》（以下简称《资料》），于 1997 年出版。编者说明，此次“共登记寺庙 1631 个”。^①

浏览这批登记表格，可以指出，此次登记的 1631 座寺庙并非全市寺庙的总量。其残缺漏洞显而易见。如：京城帝王祭祀的天、地、日、月坛等，京都藏传佛教名寺雍和宫、黄寺等，京城市民皆知的寺庙隆福寺、妙应寺（今称白塔寺）等均未列其间。90 年代，北京市档案馆编辑出版《资料》时，根据“北平市警察局档案”中的寺庙登记表，整理 1928 年的寺庙登记资料。虽然这些登记备案的表格丰富详实。但查阅其他档案卷宗，比较分析，仍可发现重要遗漏。

根据笔者的研究考证，1928 年北平市传统宗教寺庙的实际数量超出此数，至少应有 1696 座。笔者在北京档案馆曾调阅“北平市社会局档案”、“北平市民政局档案”、“北平市管理坛庙事务所档案”等相关卷宗。这些局所的档案中均有宗教寺庙登记统计表、宗教事务管理调查报告等大量档案资料。将各局档案资料汇总分析，可以发现警察局的寺庙登记档案遗漏，至少未能囊括以下两类 65 座寺庙：

其一，北平市管理坛庙事务所管理的官方寺庙 19 座，包括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孔庙、帝王庙、风神庙、云神庙、雷神庙、都城隍庙等。^②民国时期，这些原清朝

^①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版，第 26 页。

^② 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管理坛庙事务所档案》，卷宗 J57，目录 699，案卷 56。这 19 座寺庙原为清朝官方祭祀的庙宇，包括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孔庙、帝王庙、风神庙、云神庙、

官方祭祀的庙宇作为国家文物古迹事业，由政府专门机构管理，从未在警察局登记备案。

其二，蒙藏事务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蒙委会）管理的大部分寺庙。在民政局的档案中，1928年全市寺庙登记工作时，蒙委会曾有两类卷宗记录在案。

1、民政局登记材料记载，由蒙委会代理申报登记的寺庙有37座。另外，雍和宫等7座喇嘛庙单独申报。这两项合计有44座。其中仅有法海寺、圆通寺等7座同期在警察局登记备案。其余37座寺庙，包括著名的隆福寺、妙应寺、护国寺等仅在民政局注册登记。^①

2、民政局档案中，蒙委会系统的寺庙名单列有33座，其中雍和宫、嵩祝寺、普度寺、西黄寺、东黄寺、慈度寺（前黑寺）、察罕喇嘛庙（后黑寺）等24座寺庙呈交登记备案，而福佑寺等9座未查到任何登记表格。^②

综合分析民政局的有关档案，1928年全市寺庙登记时，蒙委会所辖或代理申报的寺庙中，至少有46座寺庙未纳入警察局管理寺庙的档案。

迄今为止，经档案工作整理和学者考证，北京档案馆所存的档案中，1928年京城共有儒道佛寺庙1696座。这批档案的价值是，原始登记表格比较完整，各区寺庙均有准确的地址记载。其缺陷是，统计工作者缺乏必要的宗教知识，未能分辨各类宗教寺庙，仅根据申报者自述登记。全市的寺庙中，只有22座庙自己申报为道教寺庙。这显然与京城宗教社会的实际状况有较大差距。

1936年1月，北平市政府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开展第二次寺庙登记工作。内政部制定的“寺庙登记规则”明确宣布，此次寺庙登记工作不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系统的寺庙。^③原定于1936年6月底完成全部登记工作。因时局动荡，持续到1937年底，仍未终结。

目前，在“北平市社会局档案”的卷宗中，第二次登记的寺庙按分类编号共有1213座。加上未列入登记范围政府所辖的寺庙和蒙委会管理的喇嘛庙65座，30年代中

雷神庙、都城隍庙、贤良祠、昭忠祠、旌勇祠、褒忠祠、显忠祠、五塔寺、大和斋。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北京政府内务部礼俗司设立坛庙管理处管辖。1928年，该处更名为内务部北平坛庙管理处，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1935年，该处拨归北平市政府管辖，更名为北平市政府管理坛庙事务所，隶属北平市社会局。1947年，北平市民政局成立，该所由社会局划归民政局。

^① 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民政局档案》，卷宗 J3，目录 1，案卷 260。未在警察局登记的寺庙有 37 座，包括隆福寺、护国寺、妙应寺（白塔寺）、雍和宫、西黄寺、东黄寺、慈度寺（前黑寺）、察罕喇嘛庙（后黑寺）、嵩祝寺、阐福寺、普渡寺、普胜寺、达赖喇嘛庙、同福寺、弘仁寺下院、新寺喇嘛庙、净住寺、化成寺、宝谛寺、梵香寺、慈佑寺、新正觉寺、功德寺、殊像寺、普宁寺、热合布达拉下院、关帝庙（内六区松公府夹道 9 号）、观音寺（东郊二分属三佛寺 81 号）、广成寺、宝相寺、实胜寺、常凌寺、方圆寺、资福院、广善寺、观音寺（北郊观音寺 5 号）、老虎庙。

^② 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民政局档案》，卷宗 J3，目录 1，案卷 260。蒙委会所辖寺庙中有 9 座未向市政当局登记，包括玛哈噶拉庙、长泰寺、福佑寺、慧照寺、三佛寺、正觉寺、圣化寺、东陵隆福寺、西陵永福寺。

^③ 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社会局档案》，卷宗 J2，目录 7，案卷 166。

叶，北平全市寺庙总数为 1278 座。这一数字与 1928 年登记的庙宇总量相比，锐减 24.7%。此项政府统计的数字与社会实际的差距，有待进一步挖掘史料考证。

从 1928 年到 1937 年，在国民政府管辖的古都北平，传统宗教确实呈现出江河日下的趋势。这一衰落趋势明显受到政府宗教政策的影响。国民党主持的南京政府采取的宗教政策，比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更为严厉。

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神祠存废标准，严格限制传统宗教的发展。该标准规定应废除的寺庙大多属于道教神灵系统，如：日、月、火、五岳、四渎、龙王、城隍、文昌、送子娘娘、财神、瘟神、赵玄坛、狐仙等神灵。该规定同意保留的神祠有：伏羲、神农、黄帝、仓颉、禹、孔子、孟子、岳飞、关帝、土地神、灶神、太上老君、元始天尊、三官、天师、吕祖、风雨雷神等。这一规定的存废原则，显然有自相矛盾之处。当时，国民政府的统治权威有限，实际未能严格落实执行。但政府对传统宗教的抑制政策，加速其传播事业的日渐衰落。^①

在 1936 年寺庙登记档案中，存有原始登记表格的寺庙有 1037 座，约占登记总数的 85.5%。这批表格有比较清晰的宗教分类，可供学者研究近代北京传统宗教的整体结构及各类寺庙的比例。

1947 年 7 月，北平市政府根据内政部“寺庙总登记每十年举行一次”的规定，开展第三次寺庙登记工作。^②此次登记的档案资料缺损十分严重，经档案工作者调查，仅发现原始总登记表 91 份。^③

查阅第三次寺庙登记的档案，《北平市民政局档案》中有一卷引起笔者的注意。该卷档案登记号为，全宗 J3，目录 1，案卷 260。卷宗内容为一张统计表，即：1947 年北平市各区寺庙统计表。该表分区统计各类寺庙，是笔者所见的统计表中分类数据最完整的表格。当时的政府统计人员，根据寺庙产权、主要社会功能、常驻神职人员念诵的宗教经典等因素，对全市的寺庙进行分区分类统计。根据这份统计表，1947 年全市城区郊区共有寺庙 1920 座，其中民庙 988 座，僧庙 685 座，尼庵 115 座，道观 126 座，女冠 6 座。

虽然因时局动荡，此次寺庙登记原始表格残缺，但据笔者研究，这份 1947 年的寺庙统计表可以作为研究史料。其一，档案中若干分区寺庙的详细登记目录与该统计表数字基本相符。其二，该统计表的数字曾发表在 1948 年 8 月出版的《北平市政统计》上。

^① 近代北京传统宗教日渐衰落的因素众多，但毫无疑问，政治因素最为显赫。施博尔教授认为，民国时期北京传统宗教迅速衰落，其主要原因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这一观点值得商榷。考察五四运动前后，北京传统宗教寺庙的实际状况，可以判断施博尔教授的观点基本源于主观推测，缺乏足够历史的依据。笔者将撰写专题论文，详解思路。

^② 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民政局档案》，卷宗 J3，目录 1，案卷 70。

^③ 北京市档案馆藏：《北京寺庙历史资料》，第 671 页。

二、京都寺庙主祀的神灵

分析1928年北平市警察局登记的1631座寺庙档案,大多数较具规模的寺庙均供奉多位的神灵。儒、释、道各方神灵共祀的现象十分普遍。全市各类寺庙主祀的神灵众多。总数居前16位的寺庙为,关帝庙、观音寺、七圣祠、五圣祠、龙王庙、娘娘庙、真武庙、土地庙、三圣祠、火神庙、药王庙、地藏庵、九圣祠、财神庙、弥勒寺、吕祖祠。

高居榜首的为关帝庙,共有286座。以往学者根据历史文献考证,一致认为关帝庙为京城寺庙数量之首,但统计的数量各异,多数统称有百余座。清代《乾隆京城全图索引》记载关帝庙为116座,居众庙之首。1936年,学者编纂的《北平庙宇通检》中,北平内外城11区、东南西北四郊辖区内,关帝庙仍居首位,但数量仅为38座。北京市档案馆的寺庙登记档案证明,1928年,北平城郊关帝庙竟多达286座。

这286座庙宇大多数以关帝直接冠名,也因地制宜繁衍出许多名目。例如:护国关帝、护法关帝、双马关帝、石关帝、立马关帝、西禅关帝、忠义关帝、顶冠关帝、重兴关帝、保安关帝、福寿关帝、大马关帝、天安关帝、九圣关帝、三才关帝、三财关帝、五岳关帝、五显关帝、关帝高庙、关帝鲁班、关帝七神、关帝火神、关帝五显财神、关王、镇海关王、关公、武圣、三界伏魔大帝等。关帝寺庙遍及京城内外。

排行第二的是观音寺,共有121座。其中包括庵、庙、堂、阁、院、祠、殿、白衣观音、观音菩萨、观音禅林、送子观音等。

排行第三、第四的分别为七圣祠(包括神祠、庙、庵、殿等)111座、五圣祠(包括庙、神祠、祠庙、庵等)96座。七圣祠、五圣祠大多数为城郊小庙,均为多神共祀一庙。所谓七圣、五圣的内涵无统一界定,神灵偶像多姿多彩。主祀神多为关帝、观音、龙王等,配祀神多为土地神、山神、青苗神、虫王、马王、冰雹神、财神、药王、火神、二郎神等。

引起笔者关注的现象是,在主祀神灵中,龙王的地位仅次于关帝和观音。这反映出近代北京地区现代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水平较低,城郊人民生活对大自然生态的依赖程度较高。农业耕作靠风调雨顺,城镇生活也有赖于水脉和顺。一旦暴雨成灾,永定河泛滥,京城便一片汪洋。道教系统中的自然神——龙王,是京城民众祈求福佑的重要神灵。

据当代学者研究,民国时期北京地区自然灾害频繁,重大旱灾11次,重大水灾6次,分别占总年份的四分之一和六分之一。^①虽然水灾的频率不及旱灾,但其突发性强,后果更为严重。如:1924年7月连降暴雨,永定河、大清河等暴涨,相继溃决,城郊汪洋一片,“田禾尽没,坏民房屋十之七八。”^②此次水灾,直隶一省有150万灾

^① 吴文涛、王均:《略论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自然灾害》,《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② 《陶庐老人随年录》,《近代稗海》第12辑,第406页。

民，急待赈济。当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政府税收“尽归军用”^①，无力抗灾救灾。陷于水深火热的灾民处境悲惨。社会救援乏力，广大民众愈发祈祷神灵护佑，风调雨顺，避灾趋福。数量位居前四位的寺庙合计 614 座，占京城寺庙总数的 37.6%。这些寺庙多为儒、释、道合流共祀，可代表北京寺庙文化的主流。

排行第 5 至 16 位的寺庙分别主祀龙王、娘娘、真武、土地、三圣、火神、药王、地藏、九圣、财神、弥勒、吕祖。这些神灵中除地藏和弥勒外，均为道教神灵。虽然这些寺庙中的神职人员大多为佛教僧侣，诵念佛教经典，在佛教协会注册登记，但神殿上供奉的却是道教神灵。这些佛教系统的寺庙要借助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神仙，来慰藉进香民众的灵魂。

三、京都寺庙的宗教类型：儒释道的比重

如何界定京都寺庙的宗教类型，计算儒、释、道各类寺庙的数量，是研究京都寺庙宗教结构的重要难题。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宗教文化的阐释，各有不同的思维诠释，导致风格迥异的认知。

作为研究中国宗教文化的历史学者，笔者对目前施博尔教授主持的北京寺庙研究项目，深感兴趣，但其发表的寺庙类型研究结果，实难令人苟同。施博尔先生是研究道教文化的国际著名学者。他的研究视角显然充满着张扬道教文化的色彩。他对《通检》将道教系寺庙定为 46 座提出置疑。据施教授统计，《通检》所列的 948 座庙宇中，道教寺庙有 377 座，占总数的 38%（按此数目计算应为 39.76%）。施教授认为，从祭祀神灵属性分析，现代学者所界定的民间宗教神灵，如：关帝、碧霞元君、城隍、土地等，均属道教系统。因此，此类庙宇应全部列为道教系统的寺庙。^②

这种论断值得商榷。以关帝寺庙为例。笔者查阅 1936 年北平寺庙登记档案。在现存的 1037 座寺庙卷宗中，关帝庙共有 168 座，占总数的 16.2%。其中佛教系统有 80 座，家族宗庙有 79 座，道教系统有 9 座，分别占关帝庙总量的 47.6%、47%、5.4%。

关帝崇拜始于民间对著名武将关羽的祭祀。自宋代后，历代统治者将关羽视为儒家文化道德的典范，崇信日隆。在官方儒家正统文化的大力推崇下，佛道两家也竞相供奉关羽为本门神祇。因此，起源于民间的关公信仰，在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尊崇下，明清之际鼎盛京华，成为京城各阶层民众崇祀的主要神灵。

关帝既然是儒、释、道共祀的神灵，在寺庙分类时，可依据寺庙产权、神职人员的宗教信仰、日常宗教礼仪等来界定其分属类别，不宜简单将其一律划归道教系统寺庙。

如何界定儒、释、道寺庙分类的依据，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题目。民国时期政府宗教

^① 《各省灾情概况》，第 83 页。

^② Kristofer Schipper, 'Liturgical structures of ancient Beijing', Religion and in China, Cambridge, 1995, pp19-31. 施教授论文中陈述的统计数字有误。笔者按施教授制作的论文附录一北京寺庙分类表计算，道教寺庙有 337 座，占总数的 35.5%。

管理档案中,存有当时政府职能机构和社会宗教组织对各类宗教寺庙的分类史料,可供当代学者研究参考。1936年北平寺庙登记档案中,有比较清晰的宗教分类,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近代北京传统宗教分类的认知。

按1936年北平寺庙登记表序号统计,全市共有寺庙1213座。全部登记表格大体依据寺庙宗教类型被分为:总字(僧庙)、绪字(尼僧庙)、经字(道士庙)、纬字(民庙、家庙)、纶字(女冠庙)五类。从档案表格中可以看出,管理者事先并未确立准确的登记原则,分类是在工作时,逐步摸索建立的。比如,总字庙宇中有女冠庙1座、民庙1座、尼庙10座。绪字寺庙中,有僧庙1座、家庙3座,但经字、纬字、纶字均为统一的道士庙、民庙、女冠庙。经笔者略加整理推算,此次寺庙登记共有佛教僧庙502座,佛教尼庙106座,道教道士庙97座,道教女冠庙4座,家族宗庙504座。按宗教类型计算,佛教寺庙608座、道教寺庙101座、家族宗庙504座,分别占全市寺庙总量的50%、8%和42%。

1936年寺庙登记的原始档案共缺损176份,占总量的14.5%。其中佛教寺庙缺13份、道教寺庙缺2份、家族宗庙缺161份。佛寺道观卷宗大体完整,仅缺少2%,家庙民庙卷宗缺损较多,约占总量的32%。总体评估1936年的寺庙档案,登记表格完整的寺庙占总量85.5%,应用价值可观。

从社会统计学角度考察,1947年北平市政府的寺庙登记统计表,可作为学者研究的参考资料。根据这份统计表,当时全市城区郊区共有寺庙1920座,根据庙产所属权等因素分类,各类寺庙分别为:民庙988座,僧庙685座,尼庵115座,道观126座,女冠6座。据此数据计算,家族宗庙有988座,占总数的51.4%。佛教寺庙有800座,占总数的41.7%;道教寺庙有132座,占总数的6.9%。家族宗庙多分布在郊区,约占民庙总数的76%。佛道寺庙多分布在城区,其中城区的僧庙、尼庵、道观、女冠分别占其总量的58%、80%、66%、100%。除一些著名古刹名寺位于郊野名胜之地外,大多数正统宗教寺庙位于城区,特别是由女性神职人员尼姑、女冠主持的寺庙,基本位于城区。与30年代比较,儒、释、道寺庙的比重有较大的变化。佛教庙宇下降8%,道教庙宇下降1%,家族宗庙反而上升10%。这反映出政治时局的动荡对宗教文化的影响。

30年代至40年代,经历抗日战争与国内战争,京城时局急剧动荡,社会民心危机意识弥漫,民间宗教与秘密结社势力上升,典型宗教文化佛教、道教势力有所减弱。但是,非典型宗教性的儒家文化根基深厚,在社会各阶层民众中,仍具有持久的影响力。1947年政府统计,家族宗庙占京城寺庙总数的一半。对祖先亡灵的祭祀,成为时局动乱时期民众心灵的依托。

随着近代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科举考试的废除,封建帝制的覆灭,儒家上层经典文化的迅速衰落。但是,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支柱,儒家宗庙文化仍具有得天独厚的生存沃土。

笔者认为,儒家宗庙文化是准宗教文化。其基本性格含有宗教和道德两个层面。与世界其他宗教相比,其宗教信仰观念较为淡薄,伦理思想基础较为厚重。儒家文化本质

上注重人文理性、自然法则。中国是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中华民族以天命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民族宗教观念的主要传统。佛教、道教的信仰基本属于依附的地位。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华夏民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其宗教意识将上天的风调雨顺和下民勤劳耕耘，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儒家主张以德政治理天下，敬天而不尽信天。“敬鬼神而远之”^①儒家倡导的“神道设教”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宗教思想。“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②儒家认为，神道，非鬼神之道，是取法天道，实施社会教化。中国历代统治者均视君权受命于天，以天子之位自居。世俗君权高于神权。因此，封建统治者历来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既利用宗教“教化”社会，又与宗教保持一定的距离。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形成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孝为德本”的道德规范。体现宗法制度的祖先崇拜，数千年来渗透到每个家庭之中，成为深厚的民间风俗。考察1936年的民庙档案，这种崇拜祖先的家族宗教意识清晰可见。

分析近代京城民庙的神灵，可以认知其崇拜祖先的祭祀文化特征。

其一，儒、释、道共尊的关帝信仰高居榜首，显示出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30年代家族宗庙祭祀关帝的庙宇共有79座，占现存档案民庙总量的23%。而同期，祭祀关帝的佛寺为80座、道观为9座，分别占该类寺庙总量的13%和9%。可见，皇家官府大力尊崇的关帝崇拜，对民间家族祭祀文化的影响较大，远远超过对佛教和道教的影响。

其二，土生土长的道教文化对普通民众具有独特影响力，超过哲理精致的佛教文化。在近代京城家族寺庙中，有明显佛教文化色彩的极少，道教神灵占据主要的地位。分析民庙档案可知，除主祀关帝的民庙外，道教的真武大帝和佛教的观音菩萨均有18座，分别占现存总量的5%。出乎笔者意料之外，在近代京城家族祭祀中，道教在北方的重要神灵——真武大帝，可以与佛教大名鼎鼎的观音菩萨比肩。并列第三位的是土地神、元君娘娘，其次为龙王爷。这三位道教神灵均占现存总量的4%。

其三，崇祀神灵繁多，极少供奉单一的至上尊神，充分体现出京城百姓的多神崇拜的社会意识。1936年的民庙档案中，以佛字命名的民庙只有3座，以太清、玉皇命名的民庙也只有3座。而家族宗庙中祭祀的各种神灵，五光十色名目繁多。如：有道教神灵东岳、吕祖、灵官、三官等，也有民间俗神哪吒、马神、花神、鬼王等。京城家庙供奉各种神明，与其说是对超凡力量的敬仰，以求自我精神的解脱，倒不如说是出于实际生存的欲望，企盼得到现世利益的回报。

崇拜祖先是民众宗教意识和社会生活的核心之一。祖先崇拜来源于家族制度的世俗亲情。对祖先亡灵的祭祀，使家族群体与祖先的神灵沟通。崇宗敬祖，祈求祖先护佑，驱魔避邪，降恩赐福。家族宗庙通常具有较强的社会实用功能。宗族群体的社会公益性事业往往依托于家族寺庙。这些寺庙多为“合村公建”，即由全镇、全村族居民众集资共建。寺庙由全村公共管理，除进香祭祖祀神外，兼作全村公务、学校教育，也

^① 《论语·雍也》。

^② 《易·观卦·彖传》。

有少数租赁经商。

近代京城的家族祭祀文化呈现出传统的自发趋势。无论家族人伦理性、还是多神信仰与兼容性格，都使民众的家族祭祀更趋于实用化与功利化。

四、汉传佛教的生命力

在近代京城寺庙中，佛教系统占半壁江山。可见，汉传佛教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自古代印度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经历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的冲击和交流，最终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至今仍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

伽蓝菩萨关羽与观音菩萨，成为京城佛教寺庙中最主要的神灵。统计1936年现存的599座佛教寺庙档案，主祀伽蓝菩萨关羽的佛寺有80座，占其总量的13.4%。主祀观音菩萨的佛寺有52座，占其总量的8.7%。而同期的统计数字，以佛字命名的寺庙，如：毗卢、弥陀、寿佛、大佛、卧佛、玉佛、石佛、铁佛、古佛、千佛、万佛等仅有24座，仅占其总量的4%。可见，近代京城佛寺中，菩萨的魅力远远超过佛祖的法力。

菩萨代表的慈悲为怀的宗教意识，深入京城社会各阶层。直至近代京都，佛教信仰成为广大市民阶层最重要的宗教资源之一。据1935年北平市政府公安局的统计，全市总人口为1,573,204人，其中有宗教信仰的市民为1,420,422人，占总量的90%。而142万有宗教信仰的市民中，佛教信徒为699,757人，占信教民众的49%。^①

近70万佛教信徒，占当时全市居民总数的44%。这一数字主要依据居民的自我认定。京城厚重的儒家文化传统，形成重视人的现实关系和利益的社会群体理念。普通民众的宗教意识表现出强烈的功利性格。“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民间谚语，反映出民众宗教意识注重现实人生，讲求实用的特征。“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观念，在京城普通百姓中相当流行。有时信，有时不信，有事就信，无事则不信。为了求得庇护，不论观音菩萨，或是神灵鬼怪，都可以信仰。多数民众缺乏对宗教神灵的虔诚崇拜。

五、民间道教的兴起

明清以来，儒、释、道三教日益合流，道教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附庸。清中叶以后，道教更是被官府权威一贬再贬。尽管如此，近代京城道教文化作为本土宗教流派，依然在民间社会繁衍流传。

其一，区域性道教神灵独占鳌头。

^①《北平市政府公安局户口统计图表》（1935年），第26页。值得学者重视的是，有关北京市民宗教信仰的调查资料，残缺不全，相关资料出入较大。比如，在1935年的《分区信教人口统计表》中，道教信徒仅有96人，其中男73人，女23人。而次年，全市寺庙登记时，道教道士庙有97座，女冠庙3座。据此推算，道教职业神职人员，加上民间道教信徒，绝不止96人。

自明清以来，在三教合流的推动下，关帝崇拜盛极京城。至民国年间，京城寺庙中，关帝神灵仍最为显赫。无论在传统宗教寺庙的总量中，还是在家族宗庙、佛教寺庙的总量中，关帝均高居榜首。但是，笔者惊讶地发现，在道教宫观中，位居首位的神灵是“北极真武玄天大帝”。1936年北京寺庙登记档案中，现存道教宫观95座，其中主祀真武大帝的寺庙有13座，占总量的13.7%，而主祀关帝的道庙有9座，仅占总量的9.5%。

真武大帝又称玄天上帝，是民间和道教尊奉的北方玄武神。玄武本为北方七宿之总称。自宋代起，玄武信仰逐渐兴盛，被宋真宗诏封为真武灵应真君。道教素来崇拜北斗，便推波助澜编著经书，玄武遂由古代之四方护卫神之一上升为道教大神，其塑像为“被发黑衣，仗剑龟蛇，从者执黑旗”。^①元代皇帝将真武升格为“帝”。明初，燕王朱棣举兵“靖难”时，借助北方大神真武，为其出师“正名”。他继位后，大力推崇真武，其香火盛极京城。历代皇帝与道士给真武的封号长达百字，超过任何神灵。其后，虽历经时代变迁，真武大帝在京城道教寺庙中的地位犹存。20世纪中叶，京城道庙的祭坛上，仍可见真武大帝曾显赫京华的历史印记。

其二，道教俗神在民间兴盛，众多神灵被儒、释寺庙请入祭祀殿堂。

研究近代京城寺庙主祀神灵时，笔者发现，除三教合流共祀的关帝外，儒、释、道神灵交流互祀的现象很不平衡。30年代，京城道教庙宇祭祀的佛教神灵，只有观音一位，共有6座寺庙，占其总量的6.3%。而儒、释寺庙祭祀的道教神灵众多。京城内外家族宗庙祭祀的道教神灵丰富多采，主要有真武大帝、碧霞元君、土地神、龙王、三官、财神、火神、药王、皂君、鲁班等等，约占其寺庙总量的半数以上。宗教哲理比道教精深的佛教，其寺庙也祭祀道教神灵，主要有碧霞元君、火神、药王、财神、土地神、真武大帝、龙王、马神、喜神、皂君等等，约占其寺庙总量的15%以上。

京城道教神灵中，香火最盛的首推碧霞元君。相传这位民间与道教祭祀的女神，是泰山东岳大帝之女。宋真宗朝祭泰山时，封其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民间俗称泰山娘娘。相传碧霞元君神通广大，护国佑民，尤其保佑香客多子多福。在华北地区，元君娘娘的香火极盛。

碧霞元君是道教系统的子孙娘娘。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注重生育子嗣，延续祖先命脉。“多子多福”是各阶层民众一致的渴求与期盼。因此，为祈求子嗣，接续家族命脉与香火，人们格外崇拜执掌生育的女性神仙。这种宗教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社会。据1936年京城寺庙登记资料，家族宗庙中主祀娘娘的庙宇有15座，数量位居关帝、观音、真武之后，与土地神比肩，约占总量4%。

碧霞元君香火的昌盛，佛教僧侣起到了重要作用。近代京城祭祀碧霞元君的寺庙多为佛教寺庙。据1936年统计，佛教系统的碧霞元君庙有13座，占佛教寺庙总量的2.6%，数量仅次于关帝、观音、佛祖，居第4位。

京郊最著名的妙峰山碧霞元君祠始建于明代，俗称娘娘庙，原为道士主持，香火不

^①《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6册，114页。

旺。康熙年间佛教势力上升，改由僧侣主持，香火逐渐兴盛。从18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每逢阳春四月，妙峰山开庙，朝顶进香成为京城民众的第一等大事。届时，“人烟辐辏，车马喧阗。夜间灯火之繁，灿如列宿。”^①各阶层踏青朝顶的香客多达数十万，成为京城春季规模最为盛大的民众宗教活动。

其三，道教系统的庙会繁盛京华。

在研究近代京城庙会文化时，笔者饶有兴趣地发现，虽然京城著名的寺庙多为佛教系统，但普通市民日常宗教祈祷进香的地方却多为道教庙宇。

东岳庙是京城定期庙会香火最盛的道教寺庙之一。庙内供奉着道教庞大的神灵系统。据北京档案馆的资料，20世纪30年代全庙供奉的神像共有1316座。^②主祀的神灵东岳大帝为泰山之神。传说东岳大帝主管人间生死、富贵、贫贱、善恶、疾苦、因果报应等。辅佐其执政的七十二司分列左右回廊。京城百姓认为，“此庙水陆诸天神像最全，故酬神最易。”^③无论是祈福祈寿，还是消灾除病，或为报冤雪恨，或为生意兴隆，人们纷纷来此近香求神。

道教神灵成为京城百姓日常祈求护佑的重要宗教资源。这表明虽然道教自清中叶起，在社会上层的地位日趋跌落，但在广大市民的宗教生活中仍占有相当的地位。道教系统供奉庞杂浩大的神鬼谱系。世间千般事，皆有神照应。发财、求嗣、祈雨、消灾、去病等等一切世俗需求，都有神灵专司其职。普通市民大都无心钻研精深玄妙的宗教哲理，而是迫于实际生活的需求，进香拜神，与神仙鬼怪沟通。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一向具有强烈的功利倾向，即向神灵索取护佑。世俗气息浓厚的道教很适合普通民众的心理需求。

从计量史学的角度，考察近代北京寺庙的数量及儒释道的比重，仅仅是研究近代北京宗教文化的一个侧面。要想了解在近代京城社会转型中传统宗教文化的渐衰与变异，儒家文化深厚的持续性，汉传佛教的生命力，道教俗神的民间化等等，均需要更广泛的学术视野和深入探索。

（责任编辑 黄夏年）

^①（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重印本，第63页。

^②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卷宗12，目录8，卷456。

^③（清）让廉：《京都风俗志》，刊载《北京史苑》第四辑，第288页。

psychology of religion in the USA and point out its problems, based on reviewing its history. Psychology of religion in the USA has demonstrated a rise, fall, and resurgence course over the years. Religious perspective, 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religious behavior are the fundamental dimensions of research on psychology of religion in the USA,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religion and personality, religion and mental health are in the prominent position. The divergences of two faculties and methods used by psychology-oriented researchers should be paid much attention.

The Analysis of the Types and Structures of Beijing's Temples in the Modern Times

Xi Wuyi

According to three lots of documents of the temples registered by the government in 1928, 1936 and 1947 stored in Beijing Archives, this paper made a survey of ratio between general amount and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nd analysed the types and structures of Beijing's temples in the modern times.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Beijing City in the modern times, although the traditional religious culture generally represented declining trend, but as the pillar of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temple culture of Confucianism possessed deep fertile soil for existence, sinologized Buddhism still had strong vitality, Taoist faith still developed and spread in folk society.

William Martin and the Eastward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Sciences

Duan Qi

This thesis makes an objectiv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for the role played by missionary William Martin who came to China in 19th century in the eastward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sciences from four aspects, i.e. to translate first western code-----H.Wheaton's *The Law of Nations* for China, to introduce the works of western natur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into China, to transform the Tung Wen Kuan or School of Combined Learning, to introduce Roman phonetic alphabet into Chinese characters etc. As a group of people, the composition of missionaries was very complicated, even as individuals, missionaries often also had many aspects, we should define the general evaluation for them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